



西北经济发展 定位与模式

西北经济发展定位与模式

袁 杰 著
杨永红

甘肃人民出版社

前 言

经济发展问题是现代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改革开放以后,我国一直把经济发展问题作为头等要事,从追求经济发展的速度到讲求经济发展的质量,经历了对经济发展由感性到理性,由浅到深,由量到质的认识。当我们今天再来探讨经济发展问题时,就要求既要用描述性理论来说明经济发展的实际运行状况,又要用规范性理论对经济发展的运行状况进行价值判断;不仅要反映经济发展的指标体系进行评价,还要探究其深层次的影响因素。针对我国国情,对影响经济发展的一系列问题,如社会发展的均衡度、政策的先进性、发展的经济基础、社会协调度等,尤其是对于我国极度失衡的地区经济发展状况进行研究,以保证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质量。正因如此,本书从经济增长质量评价入手,揭示导致经济发展低质量的主要因素——极度失衡的东西部发展状况。

本书包括经济增长质量、经济发展差距、经济发展定位、经济发展模式四个部分,在占有翔实、丰富的资料基础上,进行量化分析,以期实现增强地区经济实力,缩小地区差距,保证国民经济协调发展,维护社会稳定,实现国民经济持续、稳定、高质量的发展。具体内容如下:

经济增长质量。经济增长质量是评价国民经济运行状况的一个重要指标,是宏观管理、微观决策的重要依据,本文从国家宏观经济景气到个人生活质量、从政策措施到实效分析,从有形资源到无形资源、从投入到产出等诸多方面进行考虑,拟定了8个指标(即GDP环比增长速度、社会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资本技术构成提高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城镇登记失业率、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占GDP的比重、国家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财政支出中的文教科学卫生事业费占GDP的比重)作为经济增长质量的评价指标体系,在对所占有的1979—2001年数据资料分析的基础上,运用数量化模型,确定了经济增长指标量变、质变的数值界限,得出这23年中经济增长速度的适度区间为7.1%—9.3%,尤其是对于我国极高的居民储蓄率、较低的通货膨胀情况,我国经济增长的适度区间为8.2%—9.3%,但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协调、经济的有序化发展,我国经济增长速度近期将保持在7.1%—8.2%之间,可以预知,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不会再象“八五”期间那样长久保留二位数增长,一般不会超过10%,将保持在7.1%—9.3%的下限水平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这个增长速度将继续降低,但可以肯定,整个国民经济仍将以较高的速度发展。

当框定了国民经济增长的速度区间后,利用主成分分析法,确定综合评价模型,对我国 1979—2001 年的经济增长质量进行综合评价,结论是:经济发展的低谷期包括 1981、1983、1986、1989、1990、1997、2000、2001 八年;经济发展的适度期包括 1979、1980、1982、1987、1991、1996、1998、1999 八年;经济发展的过热期包括 1984、1985、1988、1992、1993、1994、1995 七年,这 23 年中无论是经济发展的低谷期,还是经济发展的过热期,都意味着经济发展的低质量,较高质量的仅有 8 年。透过这些量化分析,使我们深切感受到,不解决极度失衡的地区发展问题,不缩小东西部发展的巨大差距,就难以实现国民经济发展的质量。

经济发展差距。20 世纪,人类在创造高度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同时,也造成了各国、各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地区差距、不均衡发展,已成为一个世界性问题,已不仅是个经济问题。正因如此,中国政府将开发西部作为 21 世纪的头等大事。作为全国老、少、边、穷、极欠发展、经济发展极度失衡、落后、差距巨大的西北地区,就成为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因素。

从自然资源差异看:西北地区土地资源丰富,地广人稀,占全国陆地面积 31.7% 的西北地区,仅占全国人口的 7.25%,人均耕地面积相当于全国水平的 1.7 倍;矿产资源丰富多样,煤炭、石油、天然气均居全国最前列,人均能源拥有量也列居全国前列,西北地区能源资源总量占全国的 18.5%,但土地资源质量不高,后备资源有限。

从经济资源的差距看:西北地区产出能力低,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小,在为国家创造财富的行列中,除陕西,其余四省区均列居倒数前七位,而人均 GDP 仅相当于全国水平的 72%;产业层次低,呈典型的农业经济特征;工业发展差距巨大,企业布局密度极低,国有经济比重极高,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极度短缺,导致难以产生规模效益;财政收入低,对国家贡献程度小;由于资金投入不足,对外开放度极低,终导致生产发展水平低,居民消费水平差距令人震惊。

从人力资源的差距看:西北地域辽阔,人口稀少,但人口自然增长率较高;教育投入东多西少,但国家财政性拨款教育经费占全部教育经费的比重高居全国榜首,人均教育经费东高西低;导致人口文化素质东高西低;高等教育布局东多西少;研究与开发 R&D 经费投入分配不均,知识差距极大。

从社会资源的差异看:基础设施落后,城市化水平低,少数民族聚居,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排序中缺乏竞争力,现代化进程低。

经济发展定位。西北地区在全国的定位,表现出巨大的发展差距,在 1978 年至今的四个发展周期中,其发展态势表现为周期性波动中的经济增长。

第一阶段,农业的超常规发展,使第一产业成为促使西北经济增长的最强牵动力;产业结构调整,使第三产业成为发展速度最快的行业;优先发展工业,使第二产业增加值支撑起西北经济的半壁江山;所有制结构发生变化,形成多种经济形式并存的雏形。这一时期,人民生活质量有所提高,充分的劳动力就业,使每100个西北人中就有46个就业人员;职工工资总额增加,但与就业人员增长不同步;导致最终消费与资本形成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居民消费差距显化。

第二阶段,产业结构实现了“二三一”的突变,第二产业带动了整个西北经济的快速增长,工业成为西北经济快速增长的动因之一,建筑业成为西北经济快速增长的动因之二;第三产业成为西北经济快速增长的动因之三;第一产业的低速发展构成西北经济发展的基础。这一阶段,人民生活质量表现出,劳动就业多渠道,就业人员增速超过全国水平,但职工工资增加幅度不及全国水平,居民消费差距明显。

第三阶段,经济结构更明显地体现出“二三一”的产业结构。第二产业成为支撑西北经济增长的决定力量,工业的快速增长牵动西北经济的发展,建筑业成为西北经济的一个新的增长点;第三产业的发展速度快于全国水平;第一产业恢复性增长促使西北经济再增长;这一阶段,劳动就业极其充分,就业人员占全部人口的一半以上;职工工资差距继续扩大,居民消费差距进一步加剧;对外贸易活动刚刚起步,对国民经济的影响极其弱小。

第四阶段,第二产业成为促使经济增长的最强作用力,其中工业对西北经济增长的牵动力最大;建筑业是西北地区增速最快的一个产业;第三产业以快于全国水平的增速继续支持西北经济的增长;第一产业的低速增长维持了西北经济的增长;所有制结构调整,为西北经济注入新的发展动力;这一阶段,劳动就业人数减少,人口就业率比重下降;职工工资地区间分配严重失衡,职工平均工资差距加大;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加剧,终导致消费的巨大差距;而对外贸易活动,20多年发展缓慢,难以成为牵动西北经济增长的第三支动力。

经济发展模式。影响西北经济发展的两大因素,一是人口配置问题,二是科技进步因素。西北地区的农业经济特征刺激了人口的再生产,至第五次人口普查,农村人口仍占52.39%,就使西北地区在2001年至少存在830万剩余劳动力,而第一产业至少就有544万人,约占全部剩余劳动力的65%以上,偏低的人口文化素质,极不均衡的城镇化发展水平,就成为制约西北经济发展的第一要素。

科学技术的发展最终体现在人身上,人口素质的高低决定了科技进步的速度,决定了生产力的发展。虽然西北地区科技人员占全部人口的比重与东部地

区相当,但由于科研资金投入不足,分配不均,加之极低的科技成果产出率,就使科技进步和科技创新难以象发达国家、发达地区那样对经济起着强促进作用,但它却是促使西北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

西北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必须以发展为主题,以结构调整为主线,以科技进步为动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以改革开放为契机,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其根本目的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促使经济和社会的协调、持续发展。

作者近几年一直从事经济增长和西北经济问题研究,在进行两项国家统计局计划项目和一项省教委课题研究中,初步框定了本专著的研究内容,经过多年的潜心研究,终成此书。本专著具有如下几个特点:

1. 比较全面、客观、多角度地阐述了影响经济发展的量化和非量化因素。

2. 选题具有较强的现实应用性。利用定性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既对整个国民经济进行评价,又对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西北地区进行横向对比分析和纵向动态分析,这不仅为缩小东西部差距,开发西北提供了准确、全面、系统的分析资料,也为 21 世纪倍受关注的“发挥地区优势,缩小地区差距,协调经济发展”问题,提供了重要参考依据。

3. 理论阐述清晰,整体结构完整。本专著将人口—经济—社会环境相结合,在人类社会的循环图中探寻资源配置与经济发展的互动关系。

4. 研究结论具有一定的创新性。本书所得出的国民经济增长适度区间、我国经济增长高质量期、西北地区的发展差距、西北地区 21 世纪初的剩余劳动力人口等结论,都是作者悉心研究所得,并均给出较合实际的数值界限。

本专著从国民经济发展入手,立足西北地区,运用大量最新统计资料,在定量基础上进行深入、准确的定性分析,对许多热点问题进行大胆、有益、多视角的探究。每位作者承担的著述内容,都属各自长期研究的领域。袁杰著述经济增长质量、经济发展差距、经济发展定位中的“第四阶段”、经济发展模式。杨永红著述经济发展定位中的“第一阶段、第二阶段、第三阶段”。我们的态度是严肃客观的,写作是认真负责的,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和汗水,但这毕竟是一家之言,因此,我们真诚地希望读者能对我们的研究提出建设性意见,如果本书能给读者带来一定的启迪和裨益,这将是我们的最大的期望和满足。

袁 杰

2004 年 1 月 1 日

目 录

经济增长质量

经济增长质量的评价指标体系	(1)
经济发展周期性波动中的经济增长	(5)
第一阶段(1979—1984 年)	(6)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见端倪	(7)
(二)经济结构发生变化	(7)
(三)宏观调控刚起步,呈现出“信贷支持财政再由财政分配”的 财政金融体制	(9)
(四)人民生活实现温饱,国际经济地位有所提高	(11)
第二阶段(1985—1988 年)	(13)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稳步展开	(13)
(二)经济结构发生显著变化,产业结构实现“二三一”的转变	(14)
(三)宏观调控开始实施,呈现出不协调性和行政干预性	(17)
(四)人民生活实现向准小康水平的过渡	(18)
第三阶段(1989—1993 年)	(20)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蓬勃发展	(20)
(二)经济结构发生显著变化	(20)
(三)宏观调控:财政手段弱化,银行唱“独角戏”	(23)
(四)人民生活水平及国际经济地位的提高	(25)
第四阶段(1994 年—)	(26)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全面推进	(26)
(二)经济结构发生显著变化	(27)
(三)宏观调控进一步深化,财政金融政策不断磨合	(32)
(四)人民生活向小康水平迈进	(33)
经济增长的因素分析和实务模拟	(35)
(一)经济增长的各因素指标的量化分析模型	(35)
(二)经济增长的动态指标模型	(41)

(三)经济增长速度理想区间的框定	(42)
经济增长质量的综合评价	(45)
附表图	(49)

经济发展差距

导 言	(57)
自然资源的差距	(61)
(一)地域资源:地广人稀	(61)
(二)矿产资源:丰富多样	(61)
(三)土地资源:质量不高,后备资源有限	(62)
经济资源的差距	(63)
(一)产出能力低,对国民经济贡献小	(63)
(二)产业结构层次低	(64)
(三)工业发展差距巨大	(66)
(四)财政收入低,对国家贡献程度小	(71)
(五)资金投入不足	(72)
(六)对外开放度低	(72)
(七)消费水平低,差距令人震惊	(76)
人力资源的差距	(78)
(一)西北地区地域辽阔,人口稀少	(78)
(二)人口自然增长率高	(79)
(三)教育投入东多西少	(79)
(四)人口文化素质东高西低	(84)
(五)高等教育布局东多西少	(86)
(六)研究与开发经费投入分配不均	(88)
(七)知识差距极大	(89)
社会资源的差距	(90)
(一)交通基础设施落后	(90)
(二)城市化水平低	(91)
(三)少数民族主要分布的地区	(93)
(四)全国各省市排序中西北地区缺乏竞争力	(93)
(五)现代化进程低	(94)

附表	(95)
----------	------

经济发展定位

第一阶段(1978—1984 年)	(117)
(一)经济结构发生变化	(117)
(二)人民生活质量	(128)
第二阶段(1985—1988 年)	(136)
(一)产业结构实现了“二三一”的突变	(136)
(二)人民生活质量	(144)
第三阶段(1989—1993 年)	(152)
(一)经济结构更明显地体现出“二三一”的产业结构	(152)
(二)人民生活质量	(161)
(三)对外贸易活动刚刚起步	(169)
第四阶段(1994 年—)	(171)
(一)经济结构	(171)
(二)人民生活质量	(181)
(三)对外贸易活动发展缓慢	(190)
附表图	(193)

经济发展模式

西北地区经济运行质量的因素分析	(257)
(一)制约西北地区经济发展的人口配置问题	(257)
(二)制约西北地区经济发展的科技进步因素	(266)
西北地区可持续发展模型	(272)
(一)以经济发展为永恒的主题	(272)
(二)以结构调整为主线	(275)
(三)以科技进步为动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	(277)
(四)以改革开放为动力,大力发展开放型经济	(279)
(五)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根本出发点	(279)
(六)以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为根本目标	(281)
(七)开发西北要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282)
参考资料	(283)

经济增长质量的评价指标体系

经济增长理论是当代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是经济发展的基本内容之一。经济增长问题历史悠久,可以说,自从有了人类的社会再生产活动,就产生了经济增长。但是,对经济增长较系统的理论研究则是随着近代经济学—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形成和成熟才发展起来的。无论是重商主义者,还是重农主义者;无论是静态经济学,还是动态经济学,都从各自的研究角度揭示了经济增长理论,其中,亚当·斯密第一个系统研究并系统表述了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理论。亚当·斯密在其《国富论》中,通篇以经济增长问题为主线,确定了经济增长的涵义,并试图说明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刺激经济迅速增长的政策环境及相适应的动态均衡模式。亚当·斯密认为“经济增长就是人均产出的提高,或者是劳动产品(社会纯收入)的增加”。前者适用于不同国家和地区发展水平的横向比较,后者多用于分析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内部动态经济发展规模,二者相辅相成。其后继者大卫·李嘉图同亚当·斯密一样,认为“社会财富的增长即经济增长”。所以,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研究实质即是社会财富的增长。

经济增长理论并非只是西方经济学所独有的,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们也对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增长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并做出重大贡献,如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列宁的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理论,及前苏联经济学家菲尔德曼、波兰经济学家卡莱茨基和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等的社会主义经济增长理论,使经济增长理论同样也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学中的重要研究领域。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运用,就为实现我国经济长期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经济增长意味着物质财富的增加和积累的同时,也意味着经济增长的代价和损益,所以,经济增长质量就构成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中一个必不可少的研究内容。

当我们今天再探讨经济增长问题时,既要研究经济增长量的积累,还要研究其质的界限,经济增长量与质的有机结合,就要求既要用描述性理论来说明经济实际运行状况,又要运用规范性理论对经济运行状况进行价值判断,其目的是在描述性基础上,通过论证分析,达到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价值评价。这就使得经济增长理论的广义研究,对我国经济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经济增长的研究有助于我国资源的合理配置。现代涵义的资源是包括所有能够带来“资财的来源”。既包括有形要素,又包括无形要素;既包括生产力,又

包括生产关系,它是自然资源和经济资源的总称。所以,合理地运用自然资源、劳动力、资金、科学技术、教育资源、国家政策、区域政策、产业政策、组织管理、信息资源等,有益于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通货膨胀、控制失业率、提高资金利用率、提高规模效益,从而促使国民经济良性发展。

经济增长的研究可以揭示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必要保证—全要素生产率(技术进步)的巨大贡献。它的增长既包含非体现的技术进步,也包含与资本质量提高相对应的以及与劳动力质量提高相对应的体现的技术进步和其他不可预测的因素的贡献。现代经济增长不仅仅依赖于有形资本的投入,无形资本对经济发展的贡献越来越大,所以,提高科学技术水平,进行技术创新;提高管理水平,增强企业竞争力,改进组织,政策合理;提高教育水平,实施规模经济等,就成为我国现代经济建设的重要影响因素,就成为贯彻实施“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依靠科学技术发展生产力等政策的集中体现。科学技术对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作用力越来越大,成为各个国家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研究的重要动因。

经济增长的研究可以构造我国宏大的动态经济学,探寻经济发展的变化规律和趋势。通过对国民经济各项主要宏观经济变量在不同时期上数量变化的研究,可以发现经济发展的周期性、波动性、方向性和趋势性;通过质量评价,选择最适方案,可以总结改革开放 20 多年我国经济发展的功与过,得与失,有益于宏观决策和改革的深化,从而探寻出适合于我国经济发展的增长之路。

经济增长的研究有益于我国同世界各国进行比较研究,借鉴国外发展理论与模式,寻求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经济。发展经济学在西方具有悠久的历史和其可借鉴性,全球经济的一统化、竞争化,使得知识、经验无国界,走向文明、走向发达,成为人类进步的共识。人类进步依赖于文明的共享,经验的互补。

经济增长的研究有赖于评价指标体系和模型的建立,这就要求当研究经济增长时,既要描述量的增长,又要评价质的界限。所以,在进行经济增长研究时,首先要确定经济增长的评价指标体系。根据科学性、目的性、实用性、可比性、联系性、易取性原则,建立如下经济增长评价指标体系。

1. 国民生产总值(GNP)或国内生产总值(GDP)或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

无论是亚当·斯密,还是大卫·李嘉图,都认为经济增长即人均产出的提高或社会纯收入的增加,而现代西方经济学认为“经济增长”即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加或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加。所以,当我们对经济增长进行现实评价时,应

采用实际经济产量的增长,而不采用生产能力的增长,或潜在经济产量的增长进行研究,其计算如下:

$$\begin{aligned}\text{公式:增长率} &= (\text{报告期国民生产总值} - \text{基期国民生产总值}) / \text{基期国民生产总值} \times 100\% \\ &= (\text{报告期国内生产总值} - \text{基期国内生产总值}) / \text{基期国内生产总值} \times 100\% \\ &= (\text{报告期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 \text{基期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 \text{基期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times 100\%\end{aligned}$$

在这个公式中,揭示了国民经济宏观运行状况,它是国民经济各影响因素综合作用的复杂体现,是整个国民经济运行状况的晴雨表。

2. 全社会劳动生产率或劳动投入产出率

劳动生产率是经济增长中的要素投入量,既体现劳动力投入与产出间的量的关系,又体现劳动者自身价值的高低。它是衡量经济增长不可缺少的指标。

$$\begin{aligned}\text{公式:全社会劳动生产率} &= \text{总产出} / \text{全社会平均就业人数} \\ &= \text{GNP 或 GDP} / \text{全社会平均职工人数}.\end{aligned}$$

3. 资本技术构成或资本劳动比率或资本深化程度

资本投入是促使经济增长的一个外延扩张力,无论是粗放型经济还是集约型经济,经济的增长都不能离开资金的投入,它既可直接促使经济增长,又可发展科学技术,提高劳动者素质,实现在较高资本技术构成水平下经济的增长。

$$\begin{aligned}\text{公式:资本技术构成} &= \text{资本投入量}(K) / \text{劳动投入量}(L) \\ &= \text{劳动生产率} / \text{资本投入产出率(或资本投入效率)}\end{aligned}$$

4. 价格指数

价格指数是用固定权数算术平均数质量指标指数形式计算而来的商品零售价格总指数或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商品零售价格指数用以反映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格变动情况,但消费者不仅购买商品,还要购买劳务,零售价格指数的计算范围只包括商品,这就使之不能全面反映消费者支付的价格变动水平,而消费价格指数弥补了这个不足,它可以表明居民购买商品和劳务的价格在不同时期的变动情况,确定货币购买力的大小,是反映通货膨胀现象的经济指示器,也是衡量政府控制通货膨胀政策效果的尺度,可以作为衡量通货膨胀影响个人收入大小的工具。我国从1985年开始统计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

5. 失业率

失业率是指失业人数占全部劳动力(一般指民用劳动力人数)的比重,用百分数表示。

$$\text{公式:失业率} = \text{失业人数} / \text{民用劳动力人数} \times 100\%$$

失业率反映一个国家的经济景象,经济不稳定程度和劳动力的就业状况。

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密切相关,二者的相关分析可以表明某一时期该国经济的宏观景气。将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相结合(通货膨胀率(%) + 失业率(%) = 不安定指数(%)),可测定社会经济不稳定程度、困难程度。失业率的高低还与人民生活水平、消费水平直接相关,尤其在目前我国阶段,面对巨大的劳动力就业、再就业压力,为实现减员增效、合理就业,持续、稳定发展,失业率的研究具有重大意义。

6. 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在国民收入或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

公式:比重=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国民收入或国内生产总值 $\times 100\%$

居民储蓄存款与可支配收入、消费支出呈强相关,是人民生活水平的显示器,也是投资的唯一来源,其作用体现出金融机构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储蓄占国民收入或 GDP 比重的高低,不仅决定金融在经济增长中贡献率的大小,还决定货币供应量的大小、供需关系、投资规模、国家财政金融政策和货币政策,针对我国实情:居民储蓄存款的过激增长,超高的 M_2 /GDP 比例,要想使国民经济在目前这种扩张性货币政策下稳定发展,尤其有必要研究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占国民收入或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这一指标。

7. 国家财政收入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

国家财政是政府行使职能、推行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对宏观经济进行调控不可缺少的物质基础和重要手段,经济决定财政,财政又反作用于经济,财政支持和促进了经济的改革和发展。国家财政可支配实力的大小,科学性与否,决定着财政政策与其他国民经济宏观政策的协调性、吻合度;决定着公共财政程度的高低;决定着国家宏观调控能力的大小及其推动地区经济协调、均衡发展的能力。

公式:国家财政收入相当于 GDP 的比率=国家财政收入/GDP $\times 100\%$

8. 科学技术的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随着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越来越大。在我国发展科学技术,就得优先发展教育,提高全民素质,实现科教兴国。所以,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培养同现代化要求相适应的数以亿计高素质的劳动者和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发挥我国巨大人力资源的优势”。我国《“十五”计划纲要》明确指出:“科技进步与创新是增强综合国力的决定性因素,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必须依靠体制创新和科技创新。”科技进步和创新是 21 世纪我国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科学技术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表明科技投入与产出间的关系,表明我国科学技术进步的速度和科学技术对国民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用来描述经济增长质量的指标很多,既有生产力方面的,又有生产关系方面的,既有量化的,又有非量化的,它们综合作用,形成现实的经济状况。本文试图从国家宏观经济景气到个人生活质量、从政策措施到实效分析、从有形资源到无形资源、从投入到产出的方方面面进行考虑,拟定出经济增长的评价指标体系,但这个指标体系仅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并不能全面表述国民经济增长的全貌。下面将运用此评价指标体系进行实证分析。

经济发展周期性波动中的经济增长

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提出“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总方针,从此拉开中国经济改革的序幕。

改革开放20多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形成,商品市场、资本市场、劳务市场等不断发展和完善,市场调节功能大大增强;经济结构发生巨大变化:产出结构渐趋协调,形成“二三一”的产业结构,并向优化和升级的方向进一步发展,农业经济体制改革取得巨大成功,国有企业改革进入深化阶段;所有制结构发生巨大变化,形成“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格局,非公有制经济逐渐成为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力量;人民生活发生了由温饱向小康的历史性巨变;分配体制的改革,形成以按劳分配为主体,使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显著提高,收入来源多元化;重视经济、资源、人口与环境的协调发展,提高了生活质量,改善了生存环境;优化了消费结构,恩格尔系数逐年递减,文化消费逐年递增;宏观调控充分发挥作用,制定适宜的国家长期发展战略、长远规划及重大方针政策;财政调控,理顺了国家与企业、中央和地方、积累与消费、短期目标与长期发展的关系;税制改革规范了费税管理、加快了“费改税”的步伐;金融调控,利用金融措施、手段,加强了金融的调控能力。财政金融体制的改革,明确了国家财政的目的、职责,规范了国家银行的权限与职能,为理顺生产与消费、生产与发展、资金来源与供给,规范税费等做出巨大贡献,使投资领域进一步趋向活跃,国民经济高速发展,综合国力迅速增强,国际地位显著提高。经济总量(国内生产总值)居世界第六位,2002年全国GDP跃上10万亿元(102398亿元)的新台阶,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间在总量上的差距逐渐缩小;经济增长率居世界首位,1978—2002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率按可比价计算,为

9.36%，是新中国历史上发展最快的时期，也是同期世界各国经济增长速度最高的；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如：谷物、棉花、油菜籽、大豆、花生、甘蔗、茶叶、水果、煤、布、水泥、电视机、肉类、发电量、钢、原油、化肥、化学纤维、棉布、糖等，均居世界前列（前五位），但人均产品产量有些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对外贸易活动日益加强，2002年进出口总额达到6208亿美元，成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德国、日本、英国、法国之后的第六大贸易进出口国，进、出口总额分别占世界的3.7%和4.1%（2001年），居全球第六位；外汇储备2002年达到2864亿美元，居世界第二位；吸收外资总额居发展中国家首位，国际旅游收入2002年达到204亿美元；科教文卫事业居世界中等偏上水平，人民生活质量显著提高，实现了由温饱型向小康型的过渡。2002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963美元，居于中低收入国家，所以，人均消费水平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人民生活质量有待进一步提高。但尽管如此，我国经济在发展中却体现出明显的增长趋势。

我国自建国以来，宏观经济的周期性发展已出现8次，第9次尚未完成。自1978年以来已出现三次宏观经济的高涨期1984、1988、1993年，三次宏观经济的谷底期1981、1986、1989年。我国宏观经济发展的周期性与其特有的“政策周期”紧密相关；无论是改革开放前的国家指令性计划，还是改革开放后的国家宏观调控政策，都使得政策因素这个外生变量作用于经济系统时，使宏观经济呈现出周期性波动，我国经济的发展就是蕴藏在这种周期性波动中的持续增长，见图1.1“中国GDP增长率的波动曲线（1953—2002）”。当对我国宏观经济进行研究时，有必要分阶段对各个发展周期中经济的波动性增长进行探讨。

从历史发展的纵截面中，我们截取自1978年以来这20多年的历史资料进行详细分析。从图1.1可知，这20多年形成三个完整的波动周期和一个尚未完成的周期，即1979—1984年、1985—1988年、1989—1993年、1994年至今这四个阶段，各个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经济体制、经济结构和宏观管理手段，人民生活水平和我国国际经济地位也都发生巨变，它们综合反映出各个阶段的经济增长，详细分析如下。

第一阶段（1979—1984年）

1978年12月18日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1979年4月5—28日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正式提出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1981年6月27

日召开的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1982年9月1日党的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实行对外开放”。这一时期,拉开了中国改革的序幕。具体表现: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见端倪

1978年至十一届六中全会以前,我国经济体制是: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以计划调节为主;十一届六中全会提出“必须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同时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党的十二大报告指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1982年1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五条规定“国家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国家通过经济计划的综合平衡和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保证国民经济按比例协调发展。”这一时期,我国改革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开始建立含有市场机制的计划经济模式,但总的方针仍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这与我国当时的历史发展条件相吻合,既体现出我国自建国以来实行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的延续,又体现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在这一经济体制下,实现了国民经济的波动性发展。

(二)经济结构发生变化

经济结构的变化体现在产业结构和所有制结构两个方面:

1. 从产业结构看,三产业间的发展出现变化

1978—1984年,国内生产总值由3624.1亿元发展到7171.0亿元,GDP年均增长9.25%,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由1018.4亿元增加到2295.5亿元,年均增长7.30%;第二产业增加值由1745.2亿元增加到3105.7亿元,年均增长8.90%;第三产业增加值由860.5亿元增加到1769.8亿元,年均增长11.88%。三产业均以较快的速度增长,三产业所占比重由1978年的28.10:48.16:23.74变为1984年的32.01:43.31:24.68,第一产业所占比重稳步提高,第二产业所占比重持续下降,第三产业所占比重缓慢增长,见图1.2“三产业所占比重变化”,形成这一时期“二一三”的产业结构。其中1984年较之1978年新增的3546.9亿元GDP中,第一产业的贡献占36.01%,第二产业的贡献占38.36%,第三产业的贡献占25.63%,按可比价计算,在1978—1984年9.25%的GDP平均增长速度中,有3.33%来自于第一产业的贡献,3.55%来自于第二产业的贡献,2.37%来自于第三产业的贡献。这一时期,对国民经济增长起着重要作用的

是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这是由于：

(1) 农业的超常规发展

1978年以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率先在农村展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全面推行,使农民释放出巨大的生产积极性和空前的劳动热情,农业生产迅速增长,农村经济出现超常规增长,农产品极大丰富,粮食总产量年均增长4.9%,林业、畜牧业、渔业均有较快发展,尤其社队企业(乡镇企业的前身)发展更快,其总产值由1978年的493亿元增加到1984年的1268亿元,6年共增长157.20%,年均增长17.05%;乡镇企业数增加到607万个,乡镇企业就业人员由1978年的2827万人增加到1984年的5208万人,农民收入增长较快,人均纯收入由1978年的134元,增加到1984年的355元,年均增长13.4%,高出同期农业生产速度6.1个百分点。农村经济的迅速发展得益于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政府放权让利,提价减赋,对18种主要农产品进行大幅度提价,让利于民,结合科学技术的推广应用,获得农村改革的成功和劳动生产效率的提高。农村经济的发展,一方面改变了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长期落后,粮食供给不能实现自给自足,处于国民经济短线的状态,一方面从供给和需求两个角度,推动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1982年我国棉花产量跃居世界第一(达360万吨),1984年第一次出现卖粮难现象。

(2) 重工业的刚性带动

自建国以来我国一直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尤其在“以钢为纲”的发展战略指导下,工业对国民经济有着强作用力,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基本在70%左右,而重工业所占比重占工业总产值的一半以上。加之1978年的“洋跃进”,大量引进以冶金和石油化工为主的大型建设项目,使得在501亿元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中,重工业占53.3%,轻工业占5.5%,农业占11.3%。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农业占27.8%,轻工业占31.1%,重工业高达41.1%,重工业挤占农业、轻工业的结果,形成我国特有的重、轻、农的发展道路,呈现出高积累、低消费、高速度、低效益、重工业(尤其重视重工业)轻农业的非协调发展,尽管如此,重工业所呈现出的刚性增长仍是维持国民经济快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

(3) 轻工业的优先发展

1981年的天津工交会议,提出发展轻工业,实现重工业的转轨,由此实现了我国工业化进程中的“消费品工业补课”,使工业结构向轻工业倾斜,开始了由重、轻、农向农、轻、重协调发展的转变。轻工业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在1981、1982年甚至超过重工业所占比重,另外,轻工业所占比重除1978、1979年略低

外,其他各年 1980、1983、1984 年均与重工业比重较接近,呈现“平分秋色”之势,如图 1.3。优先发展轻工业的策略也成为促进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的另一因素。

2. 从所有制结构看,所有制结构的变化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另一因素

农村改革率先冲破“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大“集体”禁锢,为探索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所有制结构和多样化的公有制形式开辟了道路,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提供了前提条件。同时农村产业结构的巨变,以乡镇企业为主的农村二、三产业的蓬勃发展,促进了我国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1980 年提出的“三结合”就业方针,使得多种经济形式并存成为可能;对内搞活,对外开放,使非公有制经济比重迅速上升,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持续下降,真正形成“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经济结构。据测算,1978 年公有制经济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99.1%,其中国有经济占 56.2%,集体经济占 42.9%;非公有制经济所占比重仅为 0.9%;到 1984 年非公有制经济所占比重显著提高。非公有制经济的快速增长逐渐成为促进国民经济高速增长的另一因素。

(三)宏观调控刚起步,呈现出“信贷支持财政再由财政分配”的财政金融体制

1. “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包干体制

财政体制改革是从 1980 年正式开始的,在此之前国家财政仍继续实行统收统支财税体制,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在 30%以上,国家财政的权限极大,既管“吃饭”又管“建设”,而银行信贷业只针对国营商业、农副产品收购、国营工业企业部分流动资金贷款等,银行资金不足的矛盾由财政解决,这时是:“由财政支持信贷再由信贷分配”的财政金融体制。这种高度集中的统收统支财政体制不适应经济建设和地区经济的发展,中央决定打破统收统支的旧体制,由此开始了长达 13 年(1980—1993 年)的财政包干体制。1980—1984 年的“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目的在于调动地方政府发展地方经济,提高当家理财的积极性,将过去国家财政一口“大锅”,改为按行政区域设置的数十口“小锅”,分灶吃饭;财力分配由过去按中央部门的“条条”为主,改为按地方的“块块”为主;收支寻求各自平衡,在其实施的二、三年中确实调动了地方政府当家理财的积极性,促进了国民经济的调整和恢复。但分级包干削弱了中央财政的实力,使原来收不抵支的中央财政更加举步维艰,难以保证国民经济重点建设,相对于财政收入的快速增长,中央财政收入的作用明显削弱,可中央财政支出远大于中央财政收入,从